



郑毅 著

10

世纪契丹王朝构建进程的中原因素



上海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University Press



10 世纪契丹王朝构建进程的中原因素

——兼论辽代的“一元两制”政体特色

郑 毅 著

东北大学出版社

· 沈 阳 ·

© 郑 毅 201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0 世纪契丹王朝构建进程的中原因素：兼论辽代的“一元两制”
政体特色 / 郑毅著. — 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16. 8

ISBN 978-7-5517-1399-3

I. ①1… II. ①郑…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辽代
IV. ①K246. 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6448 号

出 版 者：东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文化路三号巷 11 号

邮编：110819

电话：024 - 83687331 (市场部) 83680267 (社务部)

传真：024 - 83680180 (市场部) 83687332 (社务部)

E-mail: neuph@neupress.com

http://www.neupress.com

印 刷 者：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

发 行 者：东北大学出版社

幅面尺寸：155mm × 230mm

印 张：10.5

字 数：149 千字

出版时间：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组稿编辑：刘振军

责任编辑：郎 坤

封面设计：刘江旸

责任校对：梁 洁

责任出版：唐敏志

ISBN 978-7-5517-1399-3

定 价：30.00 元

前言

中国作为“多元一体”民族国家存在至今。一方面，从历史上看，“天下一统”始终是主流，分裂时期则是历史的支脉。这种局面的产生必然有主客观条件的支撑。从地理因素看，中华民族繁衍生活的东亚地区，是一个相对完整、封闭的大陆板块，地势西高东低，河流多东西走向，西北多高原、山地，东部以平原、丘陵为主；西北地区以牧业为主，东北地区则渔猎、林产兼治，中原及长江流域则催生出中华民族繁衍生活的核心——华夏农耕文明区。自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给自足、内部交换、互通有无的农林牧渔经济生态区，这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产生的客观地理因素。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一体”文化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响。首先，历史上，中原农耕地区是一个水利资源丰富，水害异常频繁的地区，而发展农业所需要的水利管理及水利设施的兴建，都需要上下游地区的密切配合，客观上要求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与调控。这是中原封建集权政治产生的地理环境要求；其次，西北地区贫瘠的土地，脆弱的游牧经济，使得其必须仰赖与中原农耕区的物产与商品交换，这就使得中原封建集权制必然在中华民族政治格局中占据主流和支配地位，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必然性。因此，在中华民族内部，无论游牧民族还是农耕民族，只要建立大一统王朝，都必然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集权中央政府。

从历史上看，公元10世纪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公元10世纪前，以中原王朝为主要原动力，将游牧民族地区纳入版图，进而完成中国历史的大一统。公元10世纪后，以契丹民族为发

端，北方游牧民族在充分吸收中原政治体制的核心内涵基础上，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对契丹民族内部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多领域进行深刻改革，例如，政治领域实现了由游牧“世选民主”制向中原封建“一元”集权政治的转换，从而迸发出持久的活力和进取精神。始于辽，发于金元而成于清，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塑造。辽朝的政治经验对后世王朝起到极为重要的历史借鉴作用。

在论及辽史研究的现状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日本人长期以来宣传的所谓辽朝“二元论”史学观点造成的不良影响。

1919年“东洋史学”权威——津田左右吉在《满洲朝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五本上发表了《辽朝制度的二重体系》一文。后来岛田正郎对这一“二重体制”说推崇备至，并将其修正为“二元制”。

为什么津田左右吉、岛田正郎等人要为辽朝政治制度贴上“二元制”的标签呢？岛田解释说：“笔者始终主张尽管辽国为征服中国华北的一部分而仿造中国王朝的制度所建立的国家，并以汉人为其主要的构成分子之一，而其农业经济又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但仍未便将辽国视作中原王朝史的一环叙述，应归入北亚洲诸民族的兴亡史中申论。”^①

岛田的真实意图是坚持要把辽朝的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划分出去，归入一个他们为之设定的范围。日本学者在辽史研究领域进行了分裂中国的长期舆论准备之后，又抛出了辽朝为“异民族征服王朝”的歪理邪说。1944年一批日本学者秉承“军部”的意图编写的一本《异民族统治中国史》，不仅极力宣传辽朝制度为“二元制”，同时还声称辽、金、元、清诸民族政权是所谓“异民族征服王朝”，其目的在于为他们分裂中国、制造“满洲国”并进而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异民族征服王朝”寻找历史依据。

尽管日本战败已经70年，但当年日本人极力宣传的“满洲史学”的影响仍然不容忽视。由于长期以来日本人鼓吹辽朝制度“二元论”的影响，国内辽史学界将辽朝社会中的契丹人和汉人分割开

^① 岛田正郎：辽朝北面中央官制的特色[C]//李锡厚：中国历史：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4。

来去讨论契丹国家和社会的属性，进而忽视汉族在辽朝政治、经济、军事及思想文化诸领域对契丹社会变革的影响，结果往往是以抽象理论公式推演代替具体历史事实的探索。

总之，辽史研究要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所前进，史学工作者必须彻底摆脱日本学者的影响，走出他们的窠臼，实事求是地对待辽史上的民族关系，不能将辽朝等同于契丹，要充分考量汉族及中原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把辽史视为辽朝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而本书正是笔者这些年对该领域研究的一点心得，从本书的书名就可以看出笔者所要关注的核心要点。而笔者为什么选择以公元10世纪作为本书论述内容的起始段？这是因为，笔者认为公元10世纪是契丹王朝历史的精华部分，其部族社会内部变革之剧烈与外部环境变化之剧烈实属罕见，而二者恰好同时发生于这一时期。概括而言，契丹王朝的建立正是契丹统治者对契丹社会内、外环境剧烈变化的反应和在此基础上剧烈变革的产物。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南北朝由此缓缓拉开序幕。因此，用波澜壮阔一词来形容公元10世纪的契丹历史是恰如其分的。

本书主要论述的正是硬币的一面，即中原文明对契丹王朝的深刻影响。鉴于涉及的内容甚多，又由于篇幅所限，不可能全面细致地予以阐述，仅能就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主要领域给予粗略概述。其中政治、军事部分以10世纪为时间段，而经济文化部分鉴于涉及的时间段较长，仅以公元10世纪为时间段显然无法全面覆盖，因此，本书将这部分的时间段拉长，涉及整个辽王朝。在此予以说明。

郑毅

2016年3月

目 录

绪 论	1
一、“一元两制”——辽代政体的特色及缘起	1
二、“因俗而治”——辽代民族政策产生的地理因素和历史背景	3
三、“胡汉一体”——阿保机实现“一元”集权政治的措施和手段	5
四、辽史研究应当走出日本人“二元论”史学陷阱	6
第一章 五代变局与契丹肇兴：以辽初统治者进取幽州为中心	10
一、幽州刘氏集团的兴衰与塞外契丹的崛起	10
二、河东、后梁相争与阿保机南侵河朔	15
三、德光嗣位与契丹、后唐定州之战	21
四、后唐内乱与德光进取幽云	24
总结	27
第二章 汉族武装与辽初政治	29
一、幽州刘氏政权的败亡与契丹汉族武装的初步形成	29
二、幽云汉军的归附与耶律德光经略中原	33
三、灭晋自立与世宗即位——契丹中原派的失利和胜利	36
四、官卫汉将的发迹与耶律休哥掌控幽云	37

五、幽云攻防与辽宋澶渊之盟的订立——契丹中原战略的	
结束	38
余论	41

第三章 从大迭烈府到北枢密院：辽初最高军政枢机的汉化演进

.....	42
一、大迭烈府夷离堇——契丹部落联盟时期的最高军事首领	
.....	45
二、天下兵马大元帅——阿保机“变家为国”军事变革的过渡	
产物	46
三、契丹北枢密院——辽代封建皇权制度的最高军事机构	
.....	50

第四章 辽朝武装的“一元”核心：中央禁卫武装的产生和发展

.....	53
一、腹心部的草创及其发展壮大	54
二、官卫军的形成与发展	57
三、仿效北宋建立禁卫组织——殿前都点检	59
余论	60

第五章 辽朝“一元两制”政体的形成

一、辽朝行政区划的“一元两制”——州县、部族与斡鲁朵	
.....	62
二、枢密、官禁为核心，北南面官制为两翼：辽朝职官制度	
的“一元两制”	65
三、“以汉制待汉人”：辽代南面官体系构成	69

第六章 辽宋的频繁交往与辽代的农业生产

第七章 宋辽间的互市贸易往来

一、榷场建置的历史背景和沿革	88
二、榷场贸易的繁荣及其原因	91

三、榷场贸易的局限性和民间贸易	94
余论	97
第八章 汉风北渐：儒释道在辽朝的地位和作用	99
一、儒学在契丹民族中的地位和作用	100
二、佛教在辽代的地位和作用	108
三、道教在契丹民族中的地位和作用	119
结论	122
第九章 辽代史学的发展	124
一、修史概况	124
二、修史机构和史官	127
三、史学思想	128
四、史书翻译	133
五、专门史	134
第十章 法袭唐律、南北合流——辽代法律的溯源与变迁	136
一、南北院分理与《唐律》	136
二、辽代法典	138
三、刑法制度	142
四、诉讼和决狱	144
五、执行和案例	146
六、辽代法律的特点	148
第十一章 辽朝科举制度发展演变的基本特征	150
一、辽朝科举制度是唐宋科举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150
二、科举制度的施行，是辽朝选官制度的重大变革	151
三、科举制度成为传播中原儒家文化的有效途径	153
四、辽朝科举制度具有明显的民族性特征	155

绪 论

一、“一元两制”——辽代政体的特色及缘起

中国作为“多元一体”民族国家存在至今。一方面，从历史上看，“天下一统”始终是主流，分裂时期则是历史的支脉。这种局面的产生必然有主客观条件的支撑。从地理因素看，中华民族繁衍生活的东亚地区，是一个相对完整封闭的大陆板块，地势西高东低，河流多东西走向，西北多高原、山地，东部以平原、丘陵为主；西北地区以牧业为主，东北地区则渔猎、林产兼治，中原及长江流域则催生出中华民族繁衍生生活的核心——华夏农耕文明区。自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自给自足、内部交换、互通有无的农林牧渔经济生态区，这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产生的客观地理因素。

另一方面，中华民族“一体”文化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响。首先，历史上，中原农耕地区是一个水利资源丰富，水害异常频繁的地区，而发展农业所需要的水利管理及水利设施的兴建，都

需要上下游地区的密切配合，客观上要求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与调控。这是中原封建集权政治产生的地理环境要求；其次，西北地区贫瘠的土地，脆弱的游牧经济，使得其必须仰赖与中原农耕区的物产与商品交换，这就使得中原封建集权制必然在中华民族政治格局中占据主流和支配地位，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必然性。因此，在中华民族内部，无论游牧民族还是农耕民族，只要建立大一统王朝，都必然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集权中央政府。

从历史上看，公元10世纪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公元10世纪前，以中原王朝为主要原动力，将游牧民族地区纳入版图，进而完成中国历史的大一统。公元10世纪后，以契丹民族为发端，北方游牧民族在充分吸收中原政治体制的核心内涵基础上，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对契丹民族内部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多领域进行深刻改革，例如，政治领域实现了由游牧“世选民主”制向中原封建“一元”集权政治的转换，从而迸发出持久的活力和进取精神。始于辽，发于金元而成于清，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塑造。辽朝的政治经验对后世王朝起到极为重要的历史借鉴作用。

世选制是游牧民族固有的政治传统，不像中原封建政体采用“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世袭标准，而是采用一定范围的“择选”方式来选出部族领袖，并有任期限制。契丹王朝的开创者耶律阿保机正是通过世选契丹迭刺部首领，登上契丹政治舞台，进而创立辽王朝。也正因此，阿保机“变家为国”的行为，遭到了同样具有世选权利的亲兄弟的挑战，因此，“耶律阿保机在建国过程中，一方面人为中止了皇族的裂变，加强皇族的力量，以维护皇权；另一方面又改革旧俗，脱离季父房另立自己的‘家’，将皇位继承权限定在其‘家’之内，以消除皇族内部对皇权的威胁。通过这种方式，阿保机最终改造了契丹人的部族结构”^①。

其后，阿保机正式采用中原世袭制度，任命长子耶律倍为皇太

^① 杨军，“变家为国”：耶律阿保机对契丹部族结构的改造 [J]. 历史研究，2012 (3): 18-30.

子，但遭到以皇后述律平为首的草原本位集团的强力阻挠。耶律倍未能以太子身份登上皇位。辽朝连续几位皇帝——辽太宗、辽世宗、辽穆宗、辽景宗都是在非常时期，以世选方式登上皇位的。直到辽景宗在外戚和汉族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册封太子，封建世袭制度才真正在辽朝确立，但世选的残余影响仍然存在，辽朝后期兴宗、道宗、天祚三朝内部的激烈权力斗争都与此有关。

其实，从历史角度看，世选制和世袭制各有利弊，没有严格的区别。世袭制的优点是能够保证皇权血统的单一传承。缺点是只能按长幼次序选立太子，不能做到任人唯能，盲目性很大，因选择不当而造成王朝的衰落屡见不鲜。此外，过早选立太子容易造成权力中心的分散，由此导致的王朝内部的激烈权力斗争也屡见不鲜。世选制能够做到任人为能，但世选制固有的任期制和兄终弟及的多元传承制度，是封建集权制度的天然障碍。

最终实现各取所长，完美结合的是在清朝，雍正“秘密立储”制度的诞生，既能够做到选人任人唯贤、唯能，又能够保证血统的世袭。这是清朝统治者在吸取借鉴了世选与世袭的优缺点后，在封建传承制度上的一大创举，实现了统治者对继承人的绝对选择权和册立权，从而为困扰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皇位传承制度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二、“因俗而治”——辽代民族政策产生的地理因素和历史背景

一定的地理环境必然催生出相应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社会文化习俗。在这个基础上，必然要制定出适宜当地文化的治理方式。

辽朝“一国两制”政体源头的“因俗而治”政策的产生，正是源于契丹祖居故地的自然环境及其所处的地理环境。作为东胡鲜卑后裔，契丹民族居住的两河流域（今赤峰地区）处于东北门户——大兴安岭余脉草原、森林交错地区。这一地区历史上正是我国三大族系和三大文化区的交汇地。在此向北即进入蒙古高原——漠北游牧文化区；向南即中原门户——幽州重镇，进入中原农耕文化区；

向东可以快速进入辽东和东北腹地——松嫩平原，进入半农耕—半渔猎女真文化区。这样，契丹地区就成为农耕、游牧、渔猎诸民族诸文化区的交汇地。诸民族政权均能对其实施重大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原农耕民族和漠北游牧民族的文化影响力。契丹民族的历史发展也验证了这一点。

北魏年间，契丹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群体开始活跃于中原。唐贞观二年（628），契丹大贺氏联盟长摩会率契丹各部归附唐朝，“明年，摩会复入朝，赐鼓纛，由是有常贡”^①。此后数百年，这套旗鼓成为契丹部落联盟最高权力的象征。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契丹联盟长窟哥再次归附唐朝，唐廷在契丹驻地设置松漠都督府，契丹八部分设九州，以窟哥为松漠都督。各部落长称刺史，受窟哥节制。契丹驻地正式纳入唐朝版图。虽然此后契丹屡次叛服唐朝，但中原文化深刻影响了契丹民族的发展。大批契丹人进入营州、幽州地区生活，逐渐汉化，成为汉族的一分子。杰出者如李光弼成为唐朝的中兴重臣。因此，契丹民族在与唐朝交往的三百年时间里，中原文化基因已经牢牢刻在其中，只待最后的发芽结果。

另一方面，匈奴、鲜卑、突厥、回纥等诸多漠北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习俗和政治制度也对契丹产生深刻影响，例如契丹人的祭山和拜日习俗就源自匈奴的祭天习俗，《史记·匈奴列传》载：“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龙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蹕林。”^②《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也载：“匈奴俗，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③而契丹每年春秋在木叶山和黑山都要举行大的祭祀活动，由此可见二者的源流。契丹作为鲜卑的后裔，二者的关系自不待言。突厥、回纥都曾统治过契丹。唐李德裕在《会昌记功碑》中说，回纥在契丹、奚都派有

① 欧阳修. 新唐书：卷一百四十四 北狄 [M]. 北京：中华书局，1975：6468.

② 司马迁. 史记：卷九十四 匈奴列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99：2214.

③ 范晔. 后汉书：卷一百三十七 南匈奴列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使臣监督，每年要征收赋税^①。更重要的一点，回纥政权败亡后，一些回纥人进入契丹地区生活，成为契丹的一分子，例如，阿保机皇后述律平先祖即回纥人，“其先回鹘（即回纥）人糯思，生魏宁舍利，魏宁生慎思梅里……婆姑娶匀德愬王女，生后于契丹右大部。婆姑名月椀，仕遥辇氏为阿扎割只”^②。其族世为契丹贵戚，拥有很大权势，因此，契丹肇兴之初，族内以应天皇后为首的草原派的崛起，验证了漠北突厥、回纥文化对契丹的重大影响；而以太子耶律倍为首的中原派的崛起也反衬出中原文化对契丹内部的重大影响。阿保机和耶律德光委蛇在二者之间，其实内心倾向中原派，只不过不像耶律倍那样公开表明政治立场罢了。

德光夺取幽云后，中原派取得绝对政治优势，但其后进取中原的失败，又使得契丹领土局限在幽云地区，使契丹王朝彻底汉化，走拓跋北魏的道路成为不可能。辽朝统治者不得不更加重视对草原游牧民族的控制和管理。这样，在契丹内部，草原地区和农耕地区大体保持平衡。这就避免了北魏王朝彻底汉化，进而失去对漠北草原控制的历史重演。这就是“因俗而治”政策出台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因素。

三、“胡汉一体”——阿保机实现“一元”集权政治的措施和手段

所谓“胡汉一体”的“一元”政治，就是无论汉制还是胡制，都只是辽朝统治者实现集权政治的工具，顺应这一趋势的都加以利用，阻碍这一趋势的都加以改造和重建。这是因为，辽朝与中国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封建王朝不同，它最初并不是在承袭前一朝代统治政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由原来的部落联盟演变而来的，部族世选首领传统根深蒂固。因此，在阿保机“变家为国”的过程中，遭到部族贵族和家族宗亲势力的有力挑战，其中以争夺部族军事首领和政治首领的斗争最为激烈。为了夺取部族军政大权，阿保机

① 蔡美彪：《中国通史：辽史：第六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7。

② 脱脱：《辽史：卷七十一 后妃》[M]，北京：中华书局，1999：816。

及其后代充分借鉴和利用中原王朝的各项军政制度，将其迅速移入契丹军政体制中，同时对旧部族组织进行彻底改造，在此基础上创立新的部族组织，进而创造和发展了适应于契丹国家集权政治需要的新的“一元”政治体制，从而有力地促进了契丹王朝的发展和壮大。“胡汉一体”为契丹王朝的建立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一元”与“两制”同时存在于辽朝中央和地方政体中。二者非但不相矛盾，反而互为依靠、互为补充。这样在辽朝内部，就形成了中央高度集权与地方“因俗而治”共存的“一元两制”政治体制，所谓“一元”即大权集于辽帝一人的契丹封建皇权政治，所谓“两制”即“因俗而治”的具体民族政策和制度，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

这样，不但满足了辽朝皇帝“变家为国”集权政治的现实需要，又顺应了辽国境内各族人民的传统习俗和政治要求。改变了以往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后，不是迅速汉化，就是因为无法适应农耕文化而被迫退出的窘境，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中原农耕地区与草原游牧地区的高度融合，为后世金、元、清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辽史研究应当走出日本人“二元论”史学陷阱

在论及辽史研究的现状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日本人长期以来宣传的所谓辽朝“二元论”史学观点造成的不良影响。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积极谋求向外扩张，首先将目光投向了近邻朝鲜。而此时朝鲜是清朝的藩属，内政外交受到清政府的控制和约束。日本为了实现吞并朝鲜的野心，首先从文化层次上切断清朝与朝鲜的血脉联系，为公开侵略朝鲜，阻遏清政府的外交和军事干预寻找法理依据。

此时的日本政府在文化领域上，积极宣扬中国与朝鲜历史上有明确的领土边界，强调鸭绿江和图们江自古以来就是中朝两国的天然边界。1910年，日本完成对朝鲜的吞并，随即将侵略的矛头指向

了中国东北，为配合日本当局的侵略政策，1915年12月，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出版《满洲朝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为从法理上进一步侵略东北提供理论支撑，日本东亚史学界的观点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朝鲜与满蒙不可分离”论甚嚣尘上。

1919年“东洋史学”权威津田左右吉在《满洲朝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五本上发表了《辽朝制度的二重体系》一文。后来岛田正郎对这一“二重体制”说推崇备至，并将其修正为“二元制”^①，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其实这个发明不过是为辽朝的南北面官制贴上了一个新的标签^②。

为什么津田左右吉、岛田正郎等人要为辽朝政治制度贴上“二元制”的标签呢？岛田先生解释说：“笔者始终主张尽管辽国为征服中国华北的一部分而仿造中国王朝的制度所建立的国家，并以汉人为其主要的构成分子之一，而其农业经济又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但仍未便将辽国视作中原王朝史的一环叙述，应归入北亚洲诸民族的兴亡史中申论。”^③

岛田的真实意图是坚持要把辽朝的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划分出去，归入一个他们为之设定的范围。朝鲜与满蒙既然“不可分离”而中国历史上统治东北和华北地区的辽朝又曾经是“二元制”的，那么把中国的东北合并到当时在日本统治下的朝鲜也是“顺理成章”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中外学术界仍然不能完全识破日本人关于辽朝“二元制”的罪恶阴谋^④。

日本学者在辽史研究领域中进行了分裂中国的长期舆论准备之后，又抛出了辽朝为“异民族征服王朝”的歪理邪说。1944年一批日本学者秉承“军部”的意图编写的一本《异民族统治中国史》，不仅极力宣传辽朝制度为“二元制”，同时还声称辽、金、元、清诸民族政权是所谓“异民族征服王朝”，其目的在于为他们分裂中国、制造“满洲国”并进而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他们的“异民族征服王

①③ 岛田正郎. 辽朝北面中央官制的特色 [C] // 李锡厚. 中国历史：辽史.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4.

②④ 李锡厚. 中国历史：辽史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3.

朝”寻找历史依据。

联系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40 年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来考察日本的“满洲史”研究，可以发现，他们先是坚持鸭绿江、图们江自古以来就是中朝国界论，一变为满洲朝鲜不可分离论，再变则为辽朝制度二元论，最后演变成为“征服王朝”论，这一变化过程表明，这一系列的“学术研究”完全是为推行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服务的，辽史研究纯属军国主义国策的附庸。

尽管日本战败已经 70 年，但当年日本人极力宣传的“满洲史学”的影响仍然不容忽视。由于长期以来日本人鼓吹辽朝制度“二元论”的影响，国内辽史学界将辽朝社会中的契丹人和汉人分割开来去讨论契丹国家和社会的属性，进而忽视汉族在辽朝政治、经济、军事及思想文化诸领域对契丹社会变革的影响，结果往往是以抽象理论公式推演代替具体历史事实的探索。

例如，中外史学界流行一种辽朝经济制度“二元”结构说：燕云地区是封建制度，而塞外则是奴隶和农奴制度，对辽朝经济制度的这种估计，恰好可以与日本人为鼓吹“满洲独立”而提出的辽朝政治制度“二元”说相匹配。而近年来的考古墓志发现，有一大批从燕云地区迁徙到塞外的汉族地主，他们定居在宫卫管辖下的头下军州内。他们的存在，证明了头下州县实行封建土地私有制度和租佃制。同时，在他们的影响下，契丹贵族们在自己拥有的头下州县定居，并且普遍发生了汉化和封建化。这些问题，在现存的历史典籍中几乎完全不曾涉及。考古资料和碑刻、墓志完全可以说明，在辽代，不论是在燕云地区还是塞外的头下军州，封建经济制度都是当时社会经济制度的主流形态。关于辽代的官制，以往的辽史研究多认为只有南面官是采用汉官制度，忽视了汉官制度对北面官制的影响。而北面官最主要的机构是北枢密院，契丹以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机构，北面官中的确保留了契丹原有的部族官制，但如果不是有北枢密院作为统帅机构，如果不是按照中央封建王朝传统的官制对契丹部族官制进行改造，是形成不了辽朝南北面官制的。

总之，辽史研究要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所前进，史学工作者